

一代梟雄與漢奸

從汪精衛（1883-1944）詩詞窺探偽國民政府於抗戰時期的角色

慈幼英文學校 中五級 黃頌軒

隨著八年抗戰結束七十二年，有關“偽國民政府”的資料和評價亦相繼破繭而出，然而對於汪精衛在戰時的責任史學界仍眾說紛紜，而現今史學界對偽國民政府的探討，大多集中利用官方文件等客觀證據，而本文嘗試從汪精衛的《雙照樓詩詞》¹窺探其內心世界，從另一角度對偽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的角色作出探討。

汪精衛於歷史上最為人所熟知的，莫過於他於1940年3月在南京佔領區為日軍成立五院制的偽國民政府，因而被後世稱為一代漢奸。但筆者認為，倘單就表面的史事而作出評鑑，未免流於簡化，恐怕輕易排除了汪偽政權之成立，乃出於無奈的可能性。

觀乎汪氏早年詩作，如〈被逮口占〉（1910）：“他時好花發，認取血痕斑”、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”²，正是他因刺殺攝政王載灃（1883-1951）失敗，被清（1644-1912）廷判處終生監禁而題。當中可見證汪氏不畏死亡，捍衛民族大義的本性，日後出於利益而投日，實在讓人難免感到疑惑。而著名學者余英時（1930-）在《雙照樓詩詞藁》之序言中也自言在抗戰期間讀起〈被逮口占〉，認為汪氏為民族英雄，直到1946年方知其“漢奸”身份³。可見汪氏的漢奸形象，實於抗戰結束後才開始植根於民心。此外，〈獄中雜感〉、〈秋夜〉等獄中詩作也反映其早年之愛國形象。而〈廣州感事〉：“過江名士多於鯽，祇恐新亭淚不收”更反映汪氏對護法運動失敗的傷感。筆者認為，《雙照樓詩詞藁》上卷反映汪氏早年的愛國之心，是毋庸置疑的。

¹ 汪精衛著，汪夢川（1976-）註釋：《雙照樓詩詞藁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12年）。

² 同上注，頁6-7。

³ 同上注，頁7。

事實上，汪氏在 1940 年前一直主張和平，力免戰爭，從他種種行徑亦可得知。汪氏〈入吳淞口〉（1923）寫他晤見張作霖（1875-1928），面談和平統一事宜⁴，可推斷汪氏崇尚和平的立場。加上汪氏於 1927 年不惜導致“寧漢分裂”仍反對武力清黨，亦可見其人道精神。及至 1938 年 11 月 3 日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親王（1891-1945）宣佈“亞洲新秩序聲明”，其中包括“東亞的永久合作”、“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”、“經濟合作”和“世界和平”的原則。這些至少表面看似溫和的條件，勾起汪氏等政客的停戰希望，亦不足為奇。最終，汪氏於 1938 年 12 月 8 日飛離重慶，4 日後與蔣介石（1887-1975）決裂⁵。從以上各汪、蔣決裂前的事跡可以推斷，有可能是為了向日投降並“平等”地與日合作，以換取和平，而非利益。

遺憾的是，隨著日本右翼勢力抬頭，在汪、蔣決裂後，日本政府拒絕承諾“亞洲新秩序”的內容，此時汪氏方知被騙，在蔣介石派人暗殺汪氏的威脅下，他唯有無奈接受日本的要求——成立偽國民政府⁶。其中或可見一斑的證據是寫於 1939 年 6 月 18 日的〈舟夜〉⁷，當時汪氏已與蔣介石決裂，而詩中“神州重見百年沉”、“淒然不作零丁嘆，檢點不失未盡心”⁸，也或多或少反映誤信日本人的感慨。早前汪氏於 5 月 31 日從上海到日本與日人交涉，可以推斷出汪氏乃因日本反口而“未盡心”。而寫於汪氏離開重慶、到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之時的〈憶舊遊·落葉〉，表達出進其對中國未來不可知的感嘆，如“儘歲暮天寒，冰霜追逐千萬程”⁹，可見他一方面感慨自身未來日子的坎坷，另一方面亦對中國前景感到無奈。

毫無疑問，汪氏降日乃不智之舉；但若果只為利益，則不可能從其文學作品

⁴ 同註 1，頁 102。

⁵ 徐中約（1923-2005）著：《中國近代史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591。

⁶ 有關汪氏受日方欺騙，同時受到被蔣介石派人暗殺的威脅，其詳情於北京電視臺其中一齣紀錄片有詳盡說明，內容見北京電視臺：BTV 檔案。〈臭名昭著汪精衛 死後遭挫骨揚灰〉（2014 年 11 月 27 日）。載 <https://youtu.be/EhlBTO-eLz8>。

⁷ 同註 1，頁 281。

⁸ 同上註，頁 20。

⁹ 同上註，頁 306。

中見一腔悔恨。在《李宗仁回憶錄》中提及汪氏雖作漢奸，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，只是管治淪陷區的生活，並以和平交涉的方式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¹⁰。同時汪氏仍然關心持續進行的戰局，詩作亦處處流露家國之情。例如〈八月二日乘飛機到廣州，留七日別去，飛機中作三絕句寄冰如〉中有句“纔作孤鴻海上來，飛飛又去越王臺”¹¹，用孤鴻來自喻，可見其對家國之情深，亦因征戰傷亡無數而感慨。另外汪偽政權時期的〈滿江紅〉“驀地西風，吹起我亂愁千疊”¹²、〈虞美人〉“故人熱血不空流，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”¹³等句，亦反映出對家國陷於戰火的擔憂。而〈不寐〉一作中“如含瓦石愧前賢”之句，更反映出汪氏知道自己淪為傀儡時的傷感與悔疚。誠如徐中約《中國近代史》對汪氏的評價：

也許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從長期來看不會傷害中國，而短期內又可實實在在地減少大量的苦難¹⁴。

從以上各種詩作之中，都可說明汪氏於投日之後，仍然關心戰局，渴求和平，不忍同胞受苦，同時亦對於受騙於日本感到後悔和內疚。

最終汪氏於 1940 年 6 月 14 日赴日交涉，17 日抵東京，23 日會晤日本藏相河田烈（1883-1963）及首相近衛文麿，行程中寫成〈金縷曲〉一詞，處處流露着憂國憂民、卻受日人蒙騙的無可奈何。上闕的“誰與攬，澄清轡”¹⁵、下闕的“為投筆，歌斷指”¹⁶等句，讚揚了革命英雄黃興（1874-1916）於黃花崗起義中斷指一事，足見其愛國心切，誠如汪夢川以“強烈之犧牲情結”及“民胞物與之志境也”形容汪精衛，相信汪氏投日並非單純出個人利益考慮。

¹⁰ 據李宗仁所述，武漢失守、全國精華地區全部淪陷，無疑使以汪精衛為首的主告派「悲觀到了絕望的程度」，導致決定叛國投日。然而李宗仁亦承認作為「賣國賊」，汪精衛可敬之處，不單沒有作破壞抗戰的勾當，以前與汪氏淵源最深的國軍將領亦一律未曾投降。見李宗仁口述，唐德剛著：《李宗仁回憶錄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0年），下卷，頁687。

¹¹ 同註 1，頁 293。

¹² 同上註，頁 310。

¹³ 同上註，頁 304。

¹⁴ 同註 5，頁 592。

¹⁵ 同註 1，頁 317-318。

¹⁶ 同上註，頁 317-318。

汪氏對投日的悔恨，於其晚年作品中更為明顯可見。其中一次宴席間吟誦之作〈六十生日口占〉“六十年無一事成，不須悲慨不須驚”¹⁷之句，亦可謂其一生悔疚之總結，亦可作為 1940 年的汪氏不過出於曲線救國、只是為日所誤才抱恨終生的旁證。

毫無疑問，汪精衛曲“不負少年”到“六十年無一事成”是因 1938 年投日的重大錯誤，但面對比中國先進幾十年的日本，汪氏對抗戰勝利無望而委曲求全，出於愛國之心亦不無可能。至於汪精衛投日的真正目的，仍有待史學界進一步探究再作判定，然而八年抗戰死傷慘重，或許只能以汪氏〈朝中措〉中“為問青山綠水，能禁幾度興亡”¹⁸作結。

參考書目：

李宗仁口述，唐德剛著：《李宗仁回憶錄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0 年）。

汪精衛著，汪夢川註釋：《雙照樓詩詞藁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12 年）。

徐中約著：《中國近代史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）。

其他參考資料：

北京電視臺：BTV 檔案。〈臭名昭著汪精衛 死後遭挫骨揚灰〉（2014 年 11 月 27 日）。載 <https://youtu.be/EhlBTO-eLz8>。

¹⁷ 同註 1，頁 321。

¹⁸ 同上註，頁 344。